

胡适对年谱编纂的创新与继承^{〔*〕}

○ 徐国利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年谱是中国传统传记的重要体裁之一。胡适在史学上的开创性贡献之一就是年谱编纂作了创新和继承,撰写出《章实斋年谱》等知名年谱。他特别重视人物传记的撰写,认为传记人物的品格风范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工具;而年谱是传统传记中进化最好的,最接近于现代传记。他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上对年谱既有不少创新,又有诸多继承。其创新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可谓是一种继承性创新。

〔关键词〕胡适;年谱;创新;继承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8.015

在“五四”新文化时代,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风气人物。在史学领域,他不仅因大力提倡和宣扬实用主义科学方法被誉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还用科学方法在一些具体史学领域做了大胆探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研究,成就卓著。其中,就包括对传统传记体——年谱所作出的创新性研究和编纂成就。他说:“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1〕}1922年,他撰写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又名《章实斋年谱》)便是一部开风气的作品,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他又撰写出《吴敬梓年谱》和《齐白石年谱》等。这些年谱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名作。胡适之所以能够在年谱的研究和编纂方面取得这些重要成就,就在于他对传统的年谱既做了许多创新,也有不少继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徽学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12BZS002)成果。

承,为传统年谱的现代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

一、论中国传统传记与年谱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的主要体裁之一,是糅合中国传统史书的纪传体和编年体所形成的,起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2]胡适重视年谱的现代发展是因其重视人物传记的撰写。在中国现代史家中,他是特别重视人物传记的史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要贡献。朱文华说:“在近代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倡导传记史学的,不能不首推胡适。”^[3]他批评中国传统传记存在三大弊病,不符合现代传记的要求。不过,他对传统传记体中的年谱却颇加肯定,并将自己的变革主张付诸实践,先后撰写出《章实斋年谱》《吴敬梓年谱》和《齐白石年谱》等。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的撰写,是因他认为传记人物的品格风范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工具。他说,中国传统训育工作有六个弱点,第四点便是:“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西方则相反,“传记文学特别发达,其传记多能写生传神,而又纤细详尽,足为后人矜式。”^[4]他又说,“欧洲的传记文学发达的最完备,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详细的传记,往往有一篇传记长至几十万言,也往往有一个人的传记多至几十种的。”“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干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传流传下来;很少的传记材料是可信的,可读的已很少了;至于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我们对于古代大人物的认识,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轶事琐闻。”^[5]中国传统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因此,“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6]胡适对传统传记的批评既有合理性,同时也相当片面。他批评传统传记多忌讳、不详细、不动情和材料多有不可信等可谓切中其弊。但是,他批评中国传统传记缺乏伟人崇拜,人物传记“不足为后人矜式”,则相当片面。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正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特别重视传记的书写,不仅国家层面的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为主体,在地方层面的史书——地方志和家族层面的史书——族谱中人物传记也占有很大篇幅;此外,还有专门的人物传记体裁年谱和碑传等,形成了中国史学以人物记载和编纂为中心的特征。中国传统传记的宗旨即是为“后人矜式”和给后人树立道德典范。笼统批评中国传记不生动和传情也不客观,中国史学有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像司马迁、范晔和司马光等优秀史家的人物传或人物书写都写得相当生动和传情。胡适对传统传记存在这种片面认识,原因在于以西方现代传记为标准,体现了其西化论的学术文化立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

国现代学者应当撰写大量新式传记，“我在这几十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7]他劝过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梁士诒、张元济、林长民、熊希龄、高梦旦和叶景葵等人写传记。他更是身体力行，带头写各类传记，数量在现代史家中名列前茅。张越说，胡适写过的“传记、年谱性质的文章约 40 篇，包括《四十自述》等关于他本人的自传”^[8]。他写的传记，既有现代传记体，也有传统的年谱体。

胡适既然如此严厉批评中国传统的传记，为何又钟爱其中的年谱呢？究其原因，一是，他虽然主张全盘西化，却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现代性、或者说普世性的科学和民主因素，如他努力寻找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将中国文学史写成白话文学史以发掘其民主性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反传统，实际是反对传统中非科学和民主的因素，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和民主因素则极力加以发掘和继承。二是，他认为年谱是传统传记体中进化最好的，最近于现代传记体，说：“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熹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9]从中国传记体裁的发展史看，年谱确是发展比较成熟的体裁。有学者说：“一般的传记主要纪传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谱则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的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充》）。它杂糅了纪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记、行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10]可见，年谱兼采传统史书中编年体和纪传体等体裁的优点，编纂形式灵活，记事容量大，能比较全面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及社会时代背景等。因此，宋代以后年谱得到很大发展，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并成为独立的史书体裁，历代编撰的年谱数量庞大。据不完全统计，1980 年出版的杨殿珣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共收年谱 3015 种，记载谱主 1829 人。据 1992 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共收年谱 6259 种，谱主 4010 人。^[11]胡适认为中国史学进化在清代达到顶峰，最有科学性，故此说“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因此，在他看来，年谱便有了可资继承和发展的价值的意义了。

二、编纂的三部年谱

胡适撰写的年谱主要有 1922 年写出的《章实斋年谱》（以下简称《章谱》）、《吴敬梓年谱》和 1949 年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的《齐白石年谱》。其中，《章谱》影响最大。

胡适编写《章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发掘和阐发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表彰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即章学诚“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二是学术上的需要，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年谱》“太简略了”、有不少“遗漏处或错误处”，而且只记载章学诚

“一些琐碎的事,不能表见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三是爱国之心的刺激,“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个外国学者”。^[12]胡适撰写此谱的过程和方法是,在《内藤谱》的基础上,随手注明其“遗漏处或错误处”,找新材料附记于后,做大量批注;同时,利用新发现的史料来考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沿革。1922年,他终于写出“一本新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名为《章实斋先生年谱》。此谱出版后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章学诚研究热,“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13]。1925年,读了此谱的姚名达考上清华研究院后,便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14]。1928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将该谱选入《万有文库》,胡适得知已经从清华毕业的姚名达对章学诚颇有研究,便将此谱交由他来增补。姚名达于是根据《章氏遗书》等新材料对该谱作了增补和考订,胡适看过十分满意。据何炳松说,“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就把这增补本交给适之先生去校正。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15]。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增订本,即胡适著、姚名达补订的《章谱》。新版中分别收录了胡适、姚名达和何炳松所写的序。

1922年,胡适还撰写了《吴敬梓年谱》。当时,亚东图书馆根据胡适所藏嘉庆丙子本《儒林外史》加标点出版,并请他为新出版的《儒林外史》写篇新传。胡适搜集了许多有关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资料来写此传。在写完新传后,他深感明清文学家均无人给他们写年谱,因而利用所搜集资料编写了这部年谱。他说:“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16]1949年,胡适又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成《齐白石年谱》。此谱撰写的起因是,1946年秋国画大师齐白石送给他一大包资料拟请其为自己写传。胡适说,读完这些材料,“我就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记录分年编排,有时候也加上一点考订。当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话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题名作‘齐白石自述编年’。编年的骨干当然是他八十岁时写的《白石自状略》。但我不久就发现了《自状略》引用时必须稍加考订。”^[17]特别是《自状略》的年岁与其他记载往往有两岁差异的疑问始终无法解释,遂决定将编写好的《齐白石自述编年》送给与齐白石有六七十年亲切友谊的黎劭西(锦熙),请他对编年中的疑问加以批评和补订,旨在合作完成这部年谱。经黎锦熙的考订和增补,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胡适又将增补本送给邓广铭订补,最终完成了《齐白石年谱》。

由上可见,胡适对年谱的撰写是十分重视和认真的。除《吴敬梓年谱》是单独完成外,《章谱》虽是单独完成,但后来请姚名达作了大量增补,说明他对这部年谱编写的重视,力求使之考订细密、材料完备和内容丰富。《齐白石年谱》则是与黎锦熙、邓广铭三人通力合作完成的,目的是为了写出一部史实确凿、能很好反映传主画家身份的年谱。正是由于胡适对年谱编撰的高度重视,能深刻认

识传统年谱的优缺点,从而对之加以继承和创新,故使这三部年谱成为现代年谱中的史作,尤其是《章谱》更是经典之作。

三、年谱编纂上的创新

胡适能够在中国现代年谱撰著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是其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的结果,胡适及其合作者对此颇有阐述,学术界也多有研究。他用年谱为古人或现代人立传,本身就说明对年谱这种传记体在编纂形式上的认同。而且,仔细分析胡适和同时代学者对其年谱创新思想和方法的阐述,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少创新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易言之,其创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继承性的创新。

胡适在《章谱》的“序”中对于其年谱编纂的创新有相当清楚和集中的论述:

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彩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串,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了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18]

在这三点创新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实际是继承传统年谱方法上的创新,此点下文将会阐述。第三点则是与传统年谱完全不同的创新,即打破了传统传记对传主只说好处、不说其坏处的做法。这也正是他批评中国传统传记“多忌讳”的原因。

后来,对该年谱作了大量增补和考订的姚名达指出此谱体例上有七方面的创新,说:“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打破了前单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白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19]概括这七点创新,大体包括两大方面内容:一是体裁上的创新,即打破以往年谱单记行事的缺点,摘录了谱主的最重要文章以反映其思想;同时,为更好反映谱主的行事和思想,兼顾与谱主有交往的人;二是方法上的创新,既重视史料的出处,又重视考订、批评和著述的年月。应当说,这两方面的创新实际也包含对传统年谱体例的一些继承,即重视史料考订的方法,重视对谱主思想的记载。

应邀为此谱写序的何炳松将其创新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知人论世”的方

法,全面记述了章学诚的学术生平,准确把握了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他说:“替古人做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该谱即是一部“内容的美备”之作。^[20]此谱不仅全面记述了章学诚的学术生涯及其时代,而且真正把握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精神。他说,“我觉得从前研究章实斋的人,恐怕都只是求《文史通义》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义”;而细读此谱可知,“惟有他们两位才真正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义。我以为章氏的贡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这个义就是他对于史学的卓见。这种卓见最重要的,我以为有三个。我以为适之和达人两位先生已经能够把他们提出来编到这本《年谱》里面去了。”^[21]可见,何炳松主要是从《章谱》的记述内容全面和准确把握章氏学术思想来揭示其创新与贡献的。

胡适、姚名达和何炳松对《章谱》学术创新和贡献的阐发和评述,基本涵盖了该谱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上的创新所在。他们都特别强调了该谱的这一创新,即将谱主放在所处时代背景,详细记录其言行思想及相关人物的交往,注意揭示谱主的思想及其演变。对此,其它现代史家也颇为认同。梁启超称赞此谱,“不惟能撮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时代思潮”,可谓“近代学术界一盛饰”^[22]。顾廷龙说,《章谱》“始于谱中附列同辈之生卒,而以评议之词系于卒年之下,一以考见其人之见地,一为当时思想之指归,凡所议论,行事,参以己见,直加批评,开历代年谱之创例”^[23]。当代学术界有关胡适《章谱》学术创新与贡献的研究大体从这些方面作了阐发,此不详述。^[24]

四、对传统年谱编纂的继承

不过,笔者想要强调指出的是,胡适在年谱编纂上的创新主要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或者说其创新性思想和方法包含着大量传统的因素和成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其重视叙述谱主思想渊源沿革的主张是对明清学者年谱思想的继承。胡适说:“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熹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25]这里提到清代学者王懋竑的《朱熹年谱》和明代学者钱德洪的《王阳明先生年谱》,两谱的谱主分别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明代理学家王阳明。两部年谱都重视叙述谱主的思想变化及其人物交往,均是传统年谱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朱子年谱》更是对传统年谱有诸多总结和创新,故深得胡适喜爱。这里以该

谱编纂的特点为例来说明它对胡适《章谱》撰写的影响。据点校此谱的何忠礼说,与众多朱熹年谱相比,此谱有许多长处,首先,“取材审慎,疑则存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钩稽群籍,广征博引,使《年谱》记事更有依据。是书征引的各家文集、经说、史书、杂著、语类不下数十种”;复次,“贯注了作者毕生研究朱学的成果,无论对《朱熹年谱》、《文集》或本传都有是正。懋竑学问笃实,长于考证,而于《朱熹文集》、《语类》用力尤勤。”因而,此书对于研究朱熹生平、特别是其学术思想,“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而确凿的材料。”^[26]何文说的第二、第三点都是在于说明此谱重在搜寻记载和反映谱主思想的史料,以求全面记述谱主的思想渊源和演变,故此说,它为研究朱熹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而确凿的材料”。而这正符合胡适所说年谱的价值不单是记事,更在于“叙思想的沿革”。他甚至认为《朱子年谱》与自己年谱的编纂方法有同样的价值。在评述张謇之子张孝若为其父所撰年谱的写法时,胡适称赞其“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父亲的人格和志愿。”^[27]所谓充分引用谱主著作文牍做传记资料以表现谱主的人格和志愿,即是他所说的要重视谱主思想的叙述,因为人格和志愿属于思想的范畴。

第二,采纳了章学诚所说的为文人修谱应当考订其著述年月的方法。胡适之所以要采纳这种方法,即在于它最有助于弄清谱主思想渊源和发展。胡适在《章谱》“序”中称“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并大段引用章氏《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有关年谱的论述,即“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28]他十分赞同章学诚的这种思想,说:“照他这话看来,他的著作应该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了。不幸现在所传他的著作只有极少数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时的刻本《文史通义》已没有著作的年月了。”^[29]章氏著述虽然没能如其所说留下明确的著述年月,不便于人们认识其思想变化,但是其主张却被胡适所采纳。胡适编《章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30]这样,便达到了胡适所说年谱不但要记载作为谱主者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历史的目标。

第三,继承了明清年谱重视史料考证的精神和方法。明清年谱编纂得到大发展,尤其是在清代达到极盛。受清代考据学风盛行的影响,清代学者编纂的年谱都重视考证。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在何忠礼总结该年谱的三个优点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就是考证方面的,第三点也与考证有关,

所谓“实事求是”的态度、“长于考证”都说明了该年谱在考证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胡适两次称赞该谱,既有其重谱主思想渊源和沿革的优点,也包括其重考证的优点。因为,如果不能对记载谱主思想的文献和事迹作严密细致的考证,要说明谱主的思想演变是不可能的。而《章谱》在史料搜集和考订方面是花了大功夫的。胡适在1922年2月26日的日记中谈到此谱写作时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31]这里所说的“绣花针”功夫,即是指此谱撰写用了细密的考证。重考证的学风和方法实际是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正是他结合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中国大力阐释和传播杜威实用主义方法论之时。1921年,他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长文。所谓“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实是指他自己既能传播实验主义以开中国现代学术风气,又能做认真细密的考证。可见,胡适撰写年谱采用的考证方法继承了清代考据学方法。正如刘重来所说:“很明显,胡适在《章谱》中使用的一手拿‘大刀阔斧’,一手拿‘绣花针’的治学方法,与他几乎同时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既借鉴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又吸收、消化西方近代治学方法后的创造性产物。”^[32]

五、余 论

综上所述,胡适对传统传记体——年谱作了深入研究,并将自己的主张努力付诸实践,写出了《章实斋年谱》《吴敬梓年谱》和《齐白石年谱》等中国现代年谱的名作。胡适能够在年谱撰写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不仅在于积极探索年谱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等方面的创新,还在于他所作的这些创新往往包含着对传统年谱编纂思想和方法的继承,质言之,其年谱编纂的创新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继承性的创新。他的年谱编纂思想和成就为传统年谱的现代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对年谱编纂传统思想和方法的继承有些是有明确自觉意识的,有些则是隐含和下意识的。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胡适在年谱编纂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也要看到其对传统年谱理论方法的继承。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和深入认识胡适年谱编纂理论与实践成就,客观认识和评价胡适看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与方法。

其次,胡适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强调年谱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发展中也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上半叶是现代实证史学(新考据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许多新考据派史学家强调史学研究即是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其极端化的表达就是傅斯年那句有名的“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其他重视文献史料考据的大家如王国维、傅斯年、陈垣和顾颉刚相对来说来

对传统人物传记如何继承和发展鲜少关注和用力。^[33]胡适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人物却表现出与其他史家的异趣,把重视史料文献的考据与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撰写相结合,反对做只有史料和史事,而没有历史人物的史学研究,这亦可谓是胡适富有“史识”的一种表现!

注释:

[1][9][12][18][25][29][30]胡适:《胡序》,胡适著、姚名达补订:《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2、1-2、3、2、5、5页。

[2]关于中国年谱的形成、发展和编纂,可参见来新夏、徐建华合著《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一书的相关内容。

[3]朱文华:《胡适与近代中国传记文学》,耿云志、闻黎明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53-154页。

[4]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70页。

[5]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63、363-364页。

[6][27]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胡适文存》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540、541、542页。

[7]胡适:《〈四十自述〉自序》,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449页。

[8]张越:《胡适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历史教学》1999年第8期。

[10][11]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13]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7页。

[14][19]姚名达:《姚序》,胡适著、姚名达补订:《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6页。

[15][20][21]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何炳松:《何炳松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7、156、157、159、160页。

[16]胡适:《吴敬梓年谱》,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435页。

[17]胡适:《齐白石年谱·序一》,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

[23]顾廷龙:《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24]主要著述有杜蒸民:《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重来:《胡适与〈章实斋年谱〉》,周国林、刘韶军主编:《历史文献学论集》,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张爱芳:《论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价值》,《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薛艳伟:《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等。

[26]何忠礼:《点校说明》,〔清〕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7页。

[28][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58页。

[3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919-1922》(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32]刘重来:《胡适与〈章实斋年谱〉》,周国林、刘韶军主编:《历史文献学论集》,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第414页。

[33]事实上,不重视“人”的历史的史学研究,是整个20世纪中外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和突出特点。台湾著名学者王汎森对此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参见王汎森:《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载“爱思想网”:<http://m.aixiang.com/data/110165.html?from=timeline>。

[责任编辑:陶婷婷]